

基于多维视角的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路径研究

何仁伟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调研中心,北京 100101)

摘要:京津冀城市群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也是我国重点规划的三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一。打造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优化提升首都功能的主要目标和战略路径。目前,京津冀城市群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及世界上主要世界级城市群的总体发展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可从多维视角,运用全局发展思维,从世界级城市带动、三大城市群分工合作、城市群内部协同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等四个维度探讨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路径,推动城市群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城市群;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京津冀协同发展;多维视角;建设路径

中图分类号:F299.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0)03-0001-05

On Approaches to Develop World-Class City Group of Beijing-Tianjin-Hebei Based on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HE Renwei

(Research Center for City Situations, Beijing Municip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city group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c centers in our country and one of the three world-class city groups this country's planners focus on. It's this country's major goal and strategic approach to promot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and improve the functions of the capital. Currently, there remains still a large gap betwee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city group and those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major world-class city groups in the world. With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and an overall view on development, we discuss the approaches to develop the world-class city group of Beijing-Tianjin-Hebei from four dimensions: driven by world-class city groups, industrial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of three major city group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ithin the city group,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iming to help promote a 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ty groups.

Keywords: city group; Beijing-Tianjin-Hebei world-class city group;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development approach

城市群是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的空间组织形式,是指在特定连续分布的地域范围内,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以中心城市引领和带动,由不同规模、不同职能城市组成的空间紧凑、经济联系密切、分工明确的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这表明城市群内部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同时城市群又和外部区域进行着庞大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流,保证城市群的有效运转^[1]。城市群是国家经济的核心区域,是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和国际分工的重要力量。作为世界级的

城市群,不仅要求城市群内部存在着密切联系和分工合作,同时还应与所在国家(地区)的其他城市群、全世界的其他城市群均存在广泛的交流。世界级城市群不仅是以特大城市为核心的若干数量的大中小城市的有机连接与能动耦合,而且是世界级的发展高地、创新高地,是充满活力和能量的重要经济增长极^[2],更是引领国家和区域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活跃强劲的增长极。城市分布密集、人口规模巨大、经济地位核心、国际影响力突出、内部联系紧密是世界级城市群的五大特征^[3]。

收稿日期:2020-06-0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61040);北京市社会科学院2020年度一般项目(2019C5579)。

作者简介:何仁伟(1978—),男,重庆垫江人,博士,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乡村可持续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研究。

2015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京津冀地区的功能定位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这表明构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路径。目前学术界对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研究主要从产业布局^[4]、人口空间优化^[5]、城市群空间结构^[6]、生态环境治理^[7]、可持续爬升规律^[8]、城镇化质量^[9]、城市群发展对策^[10-11]等方面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京津冀城市群的总体发展水平不仅和世界上主要城市群差距明显^[12],在综合发展水平上也落后于国内的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13]。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学术界从多维视角对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发展规律及对策路径进行深入探讨的成果还比较缺乏。在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过程中,有必要以多维视角、运用全局思维,从世界、全国、城市群内部等不同层面探讨城市群建设思路和实施路径,以形成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有政策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一、京津冀城市群与国内外主要城市群差距及成因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是我国最重要的三大经济中心,也是国家重点规划的三大世界级城市群,担负着引领中国经济全面崛起的重要任务。从三个城市群各自发展现状分析,目前长三角城市群的协同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以上海为中心主导城市群内部协作,产业分工合理,资源要素配置市场化程度高,在《2010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中显示已跻身于六大世界级城市群行列。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以较小的体量和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在改革开放早期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充分发挥市场化机制的作用,目前已成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城市群内部涌现出广州、深圳、香港、佛山、东莞等一批竞争力强劲的城市,呈现多中心的“网络化、扁平化”的空间形态^[14]。相对于以上两个城市群而言,京津冀城市群经济总量较小,市场化程度较低,一体化发展相对滞后。京津冀城市群虽有北京、天津两个强大的增长极核心,但两中心互不统属,且本身处于极化阶段,造成河北省内诸多城市发展受限,未能形成有效的产业分工和协作,产生了高昂的内部协调成本。相关研究表明,虽然京津冀的研发、营销和管理等三类知识密集型职能专业化水平在三大城市群之间最高,但生产职能的专业化水平却最低^[15]。就全球视野来看,京津冀城市群与国际公认的六大世界级城市群相比,京

冀人口密度较低、经济规模(GDP总量)较小、第三产业比重低,核心城市北京金融业发展水平低于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城市化与现代化水平远落后于其他城市群,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承载能力较弱^[16]。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水平不高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核心城市(北京)对京津冀的带动作用不强

世界级城市是京津冀城市群的龙头和引擎,其带动、辐射的能力强弱影响着城市群的总体发展质量。京津冀三地古时称为“京畿重地”,由津冀“拱卫京师”,为北京提供发展所需的资源要素,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较长时期内,随着北京自身生产职能发展完善和生产要素从区域外调入的可能性增加,北京对津冀产品需求和拉动作用不断下降。随着北京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大量工业生产部门向外扩散,但津冀两地在承接产业转移时未进行明确分工,且与原有产业基础在一定程度上重叠,导致作为世界级城市的北京对京津冀区域及区域其他城市的带动能力不强。

(二)与国内其他城市群之间分工模糊

城市群是国家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区域分工合作、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的重要载体。随着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以城市群为“领头羊”和地域单元参与全球竞争和区域性分工是实现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意图的重要方式。因此,构建城市群之间的协作、分工和竞争机制,可以提高城市群的发展质量和效率。虽然国内三大城市群在规划中分别提出了自身发展定位,但三者之间分工却比较模糊,合作领域也不清晰,未在错位发展中突出城市群的特色。因此,三大城市群尚未在分工协作中实现优势互补,这也是京津冀城市发展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

(三)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分工协作不紧密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间的分工合作协作水平不高。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凭借自身优越地位集聚了众多资源和生产要素,导致津冀两地发展机会相对较少;2005年“滨海新区”纳入国家战略之后,天津迎来崭新发展机遇,从而拉开了与河北的发展差距。京津两大都市对资源具有强大的虹吸效应,聚集优势资源要素的同时也导致“大城市病”,特别是北京“大城市病”最为突出。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发展不平衡,要素流动机制尚未建立,各城市分工协作不紧密,同质化竞争突出。

(四)乡村发展滞后、城乡发展不协调

城市和乡村一个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命运共

同体,农业农村发展滞后、城乡发展不协调对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构成严峻挑战。目前,京津冀乡村人口老龄化、产业空心化、生活贫困化、农业弱质低效化、生态环境污损化等问题十分突出,区域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乡村贫困问题形势严峻,特别环首都贫困带农村贫困问题异常突出^[17-20]。城乡发展脱节、城乡互动机制不完善,农业农村对京津冀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有限。

二、充分发挥世界级城市(北京)对京津冀城市群的带动作用

目前世界经济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以城市群为参与主体的竞争,世界级城市群是这场竞争的主角,特别是处于城市群核心地位的世界级城市(国际性城市)^[21]。北京是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在国际上具有最高知名度,同时发挥着绝对的引领作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所以可参考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发展经验基础上,在疏散非首都功能的同时,发挥北京世界性城市的引领带动作用。

(1)发挥北京全国创新中心的创新带动作用。北京拥有我国城市最多的科研院所,集中了全国强大的科研实力,以创新型产业集群和“中国制造2025”创新引领示范区为平台,在与国家战略需要相关的高科技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进行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打造世界级原始创新中心,这也是引导京津冀城市群进行全球竞争和国际交流的关键所在。

(2)发展总部经济,发挥北京经济中心作用。虽然“经济中心”在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文本中不复存在,但由于决定我国经济命脉的大型国有企业总部仍在北京,企业总部数量位居全球第一。北京的全国经济管理中心的城市职能仍将长期存在。总部经济是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重要力量。北京商业基础设施发达、集中了众多的世界金融、文化、IT、生药制药等企业总部,应通过发展总部经济,聚焦国际化多维要素,推动北京创新发展,从而带动京津冀城市群发展。

(3)发挥北京文化产业基础雄厚的优势。北京历史文化悠久、古迹众多,文化基础设施丰富,可发展旅游业,以举办国际政治性会议、国际学术研讨会和科技交流会、国际体育赛事为代表的现代会展业等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中心的建设和发展,带动城市群文旅产业的转型发展。

(4)发挥北京国际交往中心的作用,提升城市群国际化水平。北京作为我国首都,是我国与国外进行政治交往的主要窗口,应以“一带一路”和习近平总书记“文明交流互鉴”讲话为契机,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交流,将北京打造成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国际交往中心,不断汇聚国际端要素,提升京津冀城市群国际化水平。

(5)大兴机场助力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将大兴机场打造为国际中转枢纽,开创北京对外开放新格局。大兴机场是展示中国实力、中国风范的新窗口,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通过发展全球临空产业链集群、提升新国门发展意识,推动国际开放性产业发展,有效吸引全球高端要素和创新要素向京津冀集聚,带动世界级城市群展翅腾飞。

(6)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打造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样板^[22]。雄安新区位于河北中部腹地,与北京、天津形成三角鼎立之势,对承接北京非首都职能转移,解决河北中部地区缺乏中心城市、改变河北中部落后面貌、打造河北新的核心增长极,优化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城市功能和空间结构具有重要意义。预则立,不预则废。根据国务院批复的《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关于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指导意见》,以雄安新区的建设为契机推动京津冀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应探索以创新为引领、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发展之路,探讨在人口密集区域建设新城、创新城市治理和绿色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探索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完善社会公平的创新之路,探索深化人口和土地管理体制的改革,推动城乡一体化的统筹发展之路。

三、加强城市群之间分工协作,发挥京津冀在北方经济中的引领作用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是新时代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单元,代表我国经济发展最高水平,直面发达国家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从全国范围看,三大城市群在国内也存在着相互竞争和相互合作,因此协调好各自利益、分工协作,实现战略互动和共同崛起方为长久之计。对此,可以采取以下对策措施:一是从国家层面建立三地区的定期交流机制,协调各自发展中的利益关系和发展方向,避免恶性竞争导致利益受损;二是根据国家定位方向和各自发展规划找准各自利益契合点,实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提升城市群内部产业竞争力;三是在高科技制造业和科技创新中进

行全方位合作,找准未来科技发展方向,为中国在全球竞争中奠定良好的科技基础;四是鼓励城市群之间同一产业类型的企业开展竞争和兼并重组,按照市场规律实行优胜劣汰,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

三大城市群之中,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均位于我国南方地区,成为引领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排头兵。近几年北方经济受全球经济不景气和国家环保政策影响减速之际,南北经济差异有扩大趋势,而京津冀地区,除北京外,天津和河北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使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因此天津和河北应紧抓国家“京津冀协调发展战略”之利,利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契机,尽快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发展。201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明确指出:要以城市群推动国家重点区域战略融合发展,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间互动融合发展。这说明京津冀城市群发展不仅仅是三省市内部的事,而应放到更大的区域板块中谋划。京津冀城市群扼守我国北方中心,东接东北、西靠晋陕,南连华北,处于渤海的中心位置,是环渤海经济圈名副其实的龙头,北方经济崛起的发动机,对促进国家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实施、国内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国家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23]。

四、多方合力推动城市群内部协同发展

全球公认的世界级城市群主要有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伦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均位于发达国家。我国要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有必要学习发达国家(地区)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经验,避免少走弯路。

(1)核心城市打造城市新区或邻近区域规划新城,打造反磁力中心,疏解城市部分职能,解决“大城市病”。重点处理好雄安新区与各城市分工协作体系:首先,雄安新区是疏解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是大北京都市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北京市区和雄安新区职能分工明确,彼此协调,相互补充;其次,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与天津产业的分工协作问题;再次是雄安新区与河北的唐山、石家庄两大中心城市的分工协作问题亟须解决,对其他城市的引导作用的定位也亟须确定。

(2)发挥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相结合的发展模

式。全球范围内,生产要素按市场规律流通,因此城市群内部应破除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的行政壁垒,使各要素根据市场原则进行交易,各地则根据资源基础和产业条件有效吸引生产要素,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效益最大化。因北京和天津属于直辖市,特别是北京的特殊政治地位,京津冀三者在行政上具有天然的不对等地位,这势必行政上限制了生产要素自由流通和城市群内部协同。因此可建立国家层面的协调委员会,由国务院直接领导,做好顶层规划和利益协调^[24];另一方面所有城市的地方政府则建立地方合作委员会,制定统一的区域协调治理机制。在人口流动、产业分工协作、利益分配、基础设施布局和建设、公共服务共享、社会治理、环境保护等方面推进协同发展。

(3)打造快捷高效、多层次的交通网络体系。首先,要打破北京与其周围邻近地区的“断头路”问题,通过轨道交通、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建设和延伸,实现首都1小时交通圈。其次,长远来看,通过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普通公路网的建设,扩大“双城(北京、天津)”对河北偏远地区的辐射、河北主要中心城市对省内邻近区域、河北省市区对周围县域的辐射。再次,发挥北京大兴机场与首都机场双国际枢纽的作用,加大对北京、天津、雄安新区等京津冀核心区的辐射,推动京津冀城市群多极联动;完善京津都市圈路网系统,建设完善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促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最后,强化对港口的统一管理,促进对外贸易发展。成立京津冀港口运输管理集团,将所有港口统一管理,根据各自基础设施和条件,明确港口功能和未来发展方向。

(4)优化城市规模等级结构,形成层级合理的“多中心”城市群协同发展体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首要任务是解决北京“大城市病”,明确了以“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为骨架的空间布局。但目前河北省缺乏500万~1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导致城市群内部城市规模等级出现了明显断层,对城市群协同发展产生负面影响^[10]。因此可从如下方面着手:一是通过市场主导、行政区划调整、政府引导等手段促进石家庄和保定做大做强,另一方面紧抓“雄安新区”契机,未来促进保定和雄安新区融合,培育两座500万~1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打造河北中南部地区的核心增长极,促进城市群城市规模等级结构的优化;二是唐山、邯郸本身为百万人口大城市,且在《京津冀发展规划纲要》中被定位为区域中心城市,可依据地理位置特征打造成河北东部、南部的区域增长极,进而

辐射河北的承德、秦皇岛、邢台等城市;三是根据《规划纲要》,可通过强化交通、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通、优化配置,进而促进京津、京保石、京唐秦三轴的完善,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体框架;四是在港口一体化基础上,打造层次分明、功能互补的港口经济合作区,进而带动京津冀沿海区域协同发展,形成第四条发展轴。

五、构建多中心引领的城乡融合空间结构

城市与乡村是一个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和地域系统,是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命运共同体。城乡分离、城乡分化、城乡失衡、发展失调将对城乡地域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因此,不能用单一的城镇化发展思维推进城市群的发展,而应把城乡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用城乡融合发展的思维来推进城市群的建设 and 高质量发展。

城乡融合是城乡通过要素双向流动、产业协同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济社会相互融合,到达城乡地域系统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结构不断优化,城乡发展水平不断缩小,最终实现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相当,城乡发展有机协调、交融一体的目标和过程^[25-27]。乡村是目前中国城乡地域系统的短板,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路径。

(1)充分发挥城镇增长极的带动作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需要发挥城镇增长极作为区域核心对其边缘或外围乡村的带动作用。目前,京津冀区域城市融合发展总体水平不高,且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的空间差异,即京津两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高,各地级市城乡融合还处于较低水平。要推动城乡融合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发

挥不同级别的城镇体系对乡村的带动作用,构建“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镇-中心村”多层次、多维度的增长极,通过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发挥以大都市区(京津)、市辖区、县城、中心镇等为载体的多层级、嵌套式增长极对乡村地域的溢出效应,采用多中心带动乡村发展的策略,发挥不同增长极的空间溢出效应,带动乡村地区与城镇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协调、共荣的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同时,将首都功能优化提升与实施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相结合,将雄安新区打造为引领城乡融合的示范区和新型增长极,推动京津冀城市群及其城乡地域系统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2)探索京津冀城乡融合发展模式。京津冀区域地理跨度较大、空间分异明显,城乡发展阶段多元特征突出,需要因地制宜地提炼城乡融合发展模式,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科学路径。京津冀城乡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城镇辐射带动能力、城镇化和工业发展阶段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可根据乡村人才、生态、文化、产业、组织特点,提炼不同类型乡村的乡村振兴模式;根据乡村比较优势和社会经济特征,以及目前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和联动发展方式,提炼不同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城市与乡村相互支撑、同命相连,因此,城乡融合发展不能就城论城、就村论村,必须发挥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双轮驱动”效应,将二者有机融合、实施城乡一体化治理,在实践中探索和总结两大战略的耦合机制、发展其耦合规律,提炼具有地区特色的城乡融合模式;同时,发挥党建在城乡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探索以社区为核心的城乡共治模式,推动京津冀城市群的城乡协调、均衡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杜朋奇.京津冀建设世界级城市群:进展与策略研究[D].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经贸学院,2018.
- [2] 范恒山.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要抓好五个着力点[N].经济日报,2020-02-13(11).
- [3] 王利伟.京津冀距离建成世界级城市群有多远——基于熵值模型方法[J].宏观经济研究,2019(9):142-152.
- [4] 罗奎,李广东,劳昕.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空间重构与优化调控[J].地理科学进展,2020,39(2):179-194.
- [5] 盛广耀.城市群区域人口变动的时空演化模式——来自京津冀地区的证据[J].城市与环境研究,2018(2):33-47.
- [6] 王晓梦,王锦,吴殿廷.“交通—产业”耦合背景下的京津冀城市群空间发育特征[J].地理研究,2018,37(9):1231-1244.
- [7] 梁龙武,王振波,方创琳,等.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化与生态环境时空分异及协同发展格局[J].生态学报,2019,39(4):1212-1225.
- [8] 方创琳,梁龙武,王振波.京津冀城市群可持续爬升规律的定量模拟及验证[J].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20,50(1):104-121.
- [9] 马奔,薛阳.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质量评价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9(4):73-83+170.
- [10] 肖金成.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发展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8(15):25-44.
- [11] 王伟.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 迈向世界级城市群[J].前线,2020(5):58-61.
- [12] 胡安俊,孙久文.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现状与实施方略研究[J].城市,2018(6):3-14.
- [13] 金鹿,王琤.京津冀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发展研究——基于三大城市群综合评价分析[J].开发研究,2019(5):53-58.

落脚点。

尽管中国文化中有老子“无为”思想的深刻烙印,可“无为无不为”的引注则显相化了老子哲学的政治哲学倾向。中国文化的经世致用倾向使研究最终都落在了“用”之上。它使广大士人走出书斋投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业中,立德、立言、立功,追求“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妙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崇尚“士以弘道”,铸就了“刚健有为”的民族精神。“有为”就是要求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准确把握有为与不能为的合理法律、政策和利益边界,严守不能为、做到不乱为”^[8]的前提下突破书斋的限制,走向社会现场,走进社会现实,匡正自身价值追求,以承担社会责任为首位,“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124],成为中国先进思想的倡导者、中国先进

文化的传播者、党的政策的支持者、学术研究的拓荒者、社会新风尚的引领人、社会正能量的发现和凝聚者,化民成俗,和谐社会,为时代代言,为人民立论。

总之,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方面要积极“求真”,处理好“为谁求真”“以何指导求真”“怎样求真”的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利益的实现和追求为目标,坚持和追求真理。另一方面又要主动“尚善”,仰望星空,崇尚高尚,具备“忧患意识”“开放心态”和“有为情怀”,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洪流中,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厚德载物担大道义,文以载道倡主旋律。唯有此,方可实现真理和价值的统一,方可在社会的发展中大显身手。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7.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
-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2.
- [4] 谢建罗.论价值的涵义与个体价值的存在[J].江汉石油职工大学学报,2019(5):55-57.
- [5] 王海明.新伦理学: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97.
- [6] 赵赞恒.忧患意识:“两个务必”的新时代内涵[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0(4):31-35.
- [7] 潘昱州,彭荔.“中国梦”视阈下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反思[J].广西社会科学,2014(8):186-188.
- [8] 李鹏.把控好“积极有为”和“不能为”的分寸边界——经济高质量发展,领导干部哪些不能为[J].人民论坛,2018(26):18-20.

(上接第5页)

- [14] 孙久文,原倩.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比较和演进重点[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5):1-11.
- [15] 张晓涛,易云锋,王淳.价值链视角下的京津冀城市群职能分工演变:2003-2016——兼论中国三大城市群职能分工水平差异[J].宏观经济研究,2019(2):116-32,60.
- [16] 安树伟,闫程莉.京津冀与世界级城市群的差距及发展策略[J].河北学刊,2016,36(6):143-149.
- [17] 蒋宁,程明洋,刘彦随,等.京津冀地区农业农村发展及城镇化影响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9,38(4):137-141.
- [18] 刘浩,马琳,李国平.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格局的时空演化[J].地理研究,2016,35(3):471-481.
- [19] 杨园园,臧玉珠,李进涛.基于城乡转型功能分区的京津冀乡村振兴模式探析[J].地理研究,2019,38(3):684-698.
- [20] 何仁伟,樊杰,李光勤.环京津贫困带的时空演变与形成机理[J].经济地理,2018,38(6):1-9.
- [21] 阎东彬,范玉凤.美国城市群空间布局优化及对京津冀城市群的借鉴[J].宏观经济研究,2017(6):114-120.
- [22] 冯凤玲,刘晓敏.雄安新区与建设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关系研究[J].现代商业,2018(12):52-53.
- [23] 颜晓峰.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思维[J].中国房地产,2019(11):18-21.
- [24] 汪彬,杨露.协调发展与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2018(6):47-51.
- [25] 何仁伟.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理论探讨、机理阐释与实现路径[J].地理研究,2018,37(11):2127-2140.
- [26] 刘春芳,张志英.从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新型城乡关系的思考[J].地理科学,2018,38(10):1624-1633.
- [27] 刘彦随.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地理学报,2018,73(4):637-650.